



中国文明对中亚草原诸文化的影响*

——以喇叭口形耳铛为考察对象

郭静云 郭立新

摘要:喇叭口形铜、金耳铛,发现于东北辽河流域燕山地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这种装饰品由夏家店下层文化原创,最初制造于公元前20世纪左右,用锡青铜铸造,此后亦用黄金制造同类器物。公元前16世纪,这种装饰品传播到黄河上中游、河套及河西地区。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采用纯铜或砷青铜,以锻造法仿制喇叭口形铜耳铛。公元前14世纪之后,这种以纯铜或砷青铜锻造的喇叭口形耳铛继续向西传播到天山和阿尔泰山地区,并少量出现在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中。公元前12—公元前11世纪之后,此类喇叭口形耳铛在阿尔泰山西麓、巴尔喀什湖流域仍颇为流行,但在中国地区反而已不再使用。该器物的西传证实了大草原东、西向连接的早期过程。

关键词:喇叭口形耳铛;夏家店下层文化;欧亚草原;北方系青铜器;草原文物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1-0011-10

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证据很完整,涉及各方面的技术和社会组织。这种证据的完整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古老的稻作文明中,华北地区和东亚草原的文明化过程也都有着深厚的本土基础。很多资料显示,中国文明也影响了中亚草原诸文化,二者之间的交流贯通了东西交往的传播路线,其中源自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文化因素传播颇为重要。本文将分析东亚草原流行的喇叭口形装饰,并证明这是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原创器物,后来传播到整个亚洲草原,而不是从中亚草原传播到中国。

一、学界关于喇叭口形耳铛的争议

喇叭口形耳环或耳铛有铜质和金质两种,

学界均认为这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认为这种耳铛来源于中亚^①。同时,这种饰物也出土于四坝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林沅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不仅耳铛相同,陶器纹样也相似,两种文化之间可能存在以“中间人群”为媒介而进行的交流活动,而且文化因素的源头无疑是安德罗诺沃文化^②。他进一步认为,所谓“喇叭口形耳铛”是从哈萨克东部,“经伊犁河谷,由新疆传布到四坝文化之中的”^[1]。

这种认识明显存在年代学和技术方面的矛盾。有关年代的疑问,乌恩岳斯图曾指出:“西西伯利亚和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均不早于公元前14世纪或前13世纪。然而,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中段的夏家

收稿日期:2025-04-15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鲁慈国际汉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早期矿冶遗存研究”(SDUZHJ[2023]3895,LC202302)。

作者简介:郭静云,女,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 215163),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历史与文化暨文物考古研究、中外文明互鉴与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郭立新,男,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275),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陕西咸阳 712000),主要从事先秦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亲属制度与社会结构研究。

店下层文化和大坨头文化耳环的年代可以早到夏纪年的范围之内,即早于公元前16世纪。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的铜耳环既有喇叭口形,也有管状的。其中火烧沟墓地出土典型的喇叭形耳环,而该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20—公元前18世纪(笔者注,实际断代可能略晚一些,约为公元前17世纪)。因此,如果

确认喇叭形耳环源自东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那么需要了解喇叭形铜耳环究竟出自该文化的哪一阶段及具体的年代,以及经何种途径加以传播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令人信服结论。”^[2]笔者拟从时空框架和技术特色论述此难题。喇叭口形器在中国、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时空分布如图1、图2、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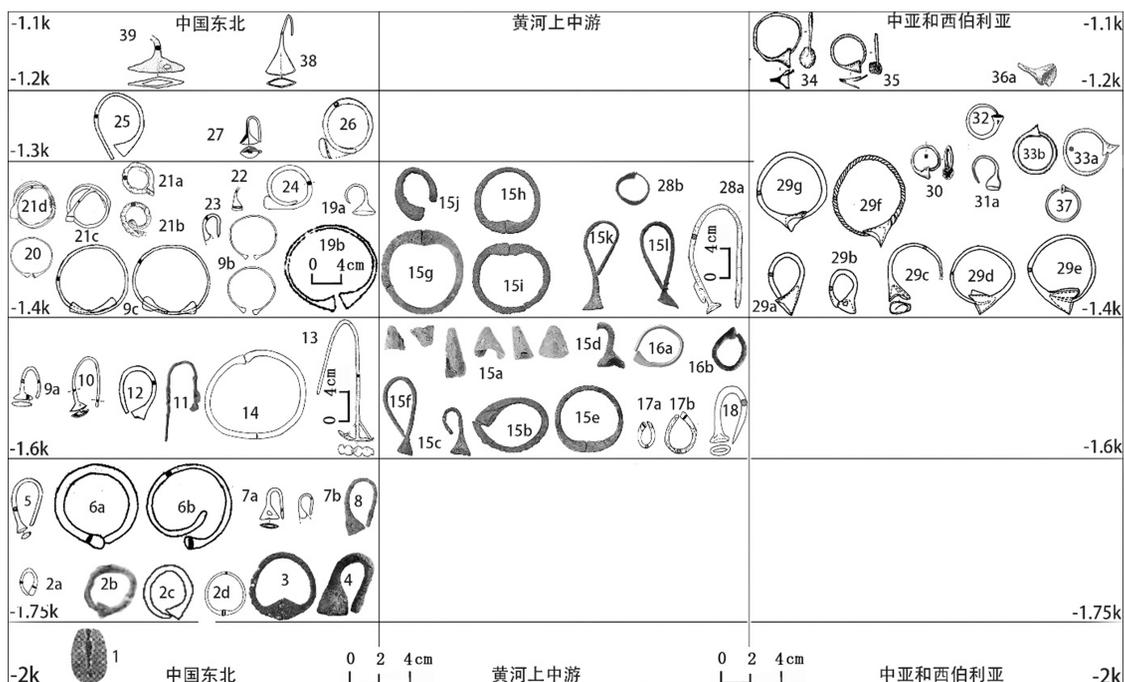


图1 喇叭口形器时空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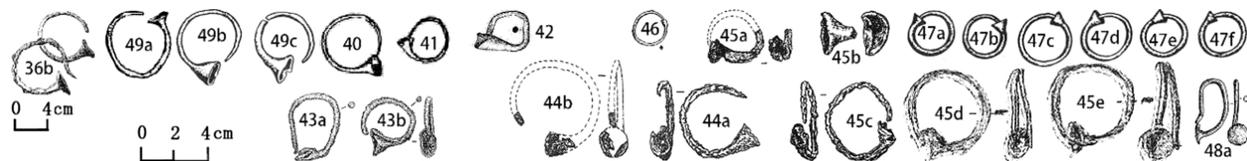


图2 中亚巴尔喀什湖、西阿尔泰、西西伯利亚,公元前1100—公元前800年的喇叭口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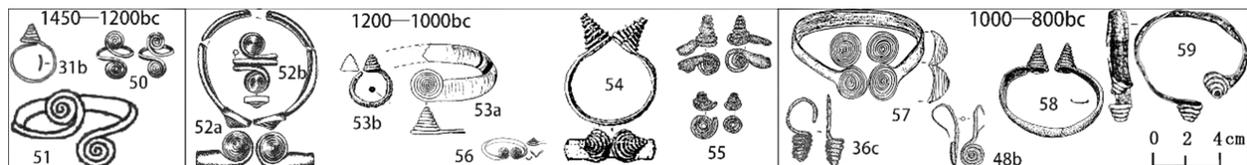


图3 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铜丝卷线卷喇叭形器

二、喇叭口形耳铛在辽河流域 夏家店下层文化本地铸造

与喇叭口形耳铛相关的最早遗存,是赤峰

四分地东山咀遗址出土的陶范(1)^③。四分地东山咀遗址是赤峰阴河河谷平地的农耕聚落,存在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二期(或谓“早期二段”,公元前2000—公元前1750年)^④。虽然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二期的铜

耳铛,但是陶范不仅证明当时已经有这些器物,且能够证明这些铜耳铛就是在本地制造的。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盛期(或谓“三期”,公元前1750—公元前1400年)的很多遗址中出土了这类铜耳铛,其中敖汉旗大甸子单个墓地就出土了51件铜环,1件金环(2a)^⑤。这是迄今出土这类铜耳铛数量最多的遗址,时代也偏早。形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仅一端有喇叭口,有点像红山文化常见的兽头玉玦形状,共出土14件(2b、2c)^⑥;第一种是圆环铸型折断成为开口,对接两侧端皆呈扁喇叭口状,与红山文化双兽头玉玦形状相似(2d)。此外还有很多一般的耳环,或许传承了东北地区的玉玦传统。

喇叭口耳铛另见于其他夏家店下层文化三期遗存中,如赤峰二道井子遗址的房子里出土了同样的铜耳铛(3)^⑦;敖汉旗西大梁遗址出土的铜耳铛的喇叭口比较宽,表现出样式的多样性(4)^⑧。此外还有辽西阜新平顶山遗址,不过由于发掘过程中没有厘清墓葬,出土情况不明(5)^⑨。

夏家店下层文化耳铛、指环都是锡青铜,锡的比例均在10%左右,或不含铅,或含低铅^⑩。这符合东北矿源锡多铅少的情形。此外,这些小型耳铛并非锻造,均为铸造,或铸造后另经过热加工。无论这些装饰品是否受到了兴隆洼文化或红山文化常见玉器形状的影响,毋庸置疑的是,这些铜饰都是在当地制造的。

在辽河流域以外的地区,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三期同时的辽东地区庙后山文化类型,以及高台山文化亦见有此类器物^⑪。如辽宁本溪庙后山遗址出土了10件喇叭口形铜耳铛,年代为公元前1750—公元前1400年(6)^⑫。

在公元前18世纪,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到燕山以南,被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或“大坨头文化”,其年代范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至殷商一期(公元前1800—公元前1300年)^⑬。燕南地区遗址也零星出土了一些一端为喇叭口的铜耳铛,如位于燕山南麓桑干河上游支流壶流河流域的河北蔚县三关遗址墓葬所出铜耳铛,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800—公元前1600年(8)^⑭。这样的铜耳铛还见于北京昌平区张营遗址三期地层中,年代也大致相同(公元前

1750—公元前1550年,7a-b)^⑮。由于张营所出非墓葬,其可能不像大甸子墓地这样用于贵族丧礼。

由于测年不甚精确,我们只能将其中少数几件器物确定为公元前16世纪之前的器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喇叭口形耳铛都分布在中国东北的辽河流域、燕山及环渤海地带,这些地区还出土了制造该器的范,而其他地区根本未见早于公元前16世纪的喇叭口形耳铛。

公元前1600—公元前1400年,同样的铜耳铛已普遍出现在环渤海地区,如天津蓟县围坊遗址二期和张家园遗址一期(10、9)^⑯均有出土。河北易县下岳各庄第一期也出土了一对同样的铜耳铛(12)^⑰。河北蔚县前堡墓区的喇叭口形铜耳铛残缺,推测其原本应有同样的喇叭口形(11)^⑱。辽宁绥中东王岗台出土了殷商时期类似的铜耳铛,但是尺寸大两倍(13)^⑲。

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从东北、河北南下到山东,影响了岳石文化。所以岳石文化遗址也零星出土了喇叭口形耳铛或手环(14)^⑳。

三、黄河上游四坝文化喇叭口形耳铛的年代和技术

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以后,同类耳铛开始出现在黄河上中游及河西走廊地区,均属于四坝文化体系。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扁状喇叭口形金耳铛,断代为公元前1670—公元前1520年(16a-b)^㉑。火烧沟遗址另外还出土了铜耳铛,其合金种类多样,包括低锡青铜、砷青铜和纯铜,其中大部分是热锻造^㉒。甘肃民乐六坝镇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金耳铛和铜耳铛(17a-b),与大甸子墓所出土的一样,年代同时或略晚(公元前1600—公元前1400年),而其中的一件铜耳铛是用砷铜制造的^㉓。

四坝文化墓葬所出耳铛、指环均用铜线锻造,所用材质也较为多样,表明该地有另一种冶铜技术和耳铛制作传统,而类似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饰品数量比较少,喇叭口形耳铛或为外来。甘肃酒泉市干骨崖墓地二、三期(公元前1650—公元前1400年)所出的,是典型的铸造的喇叭口形耳铛(18)^㉔,或许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

甘肃临潭县磨沟墓地早晚期墓葬都出土了喇叭口形耳铛。墓地年代约为公元前1650—公元前1250年^⑤,最早可能到公元前1750年,晚期到公元前1100年^⑥。在磨沟二期(公元前1600—公元前1400年)墓葬里出土了数种铜耳铛(15a-e)^⑦,大部分是锡青铜铸造,锡的比例为11%^⑧。磨沟墓地另外还出土了锻造的喇叭口形铜耳铛(15f)^⑨。在磨沟墓地三期(公元前1400—公元前1200年)墓葬中,铸造的铜耳铛变少,目前仅发现数件两端扁状喇叭形类(15g-j),锻造的反而变多(如15k-l)。朱开沟出土的喇叭形环,主要也是锻造的(28a-b)。

已有学者指出,这种喇叭口形和扁状喇叭形端耳铛,在河西、河套地区遗址中的出土率,远低于普通铜线环^⑩。这或许能够间接证明,喇叭口形耳铛都源自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使用青铜铸造后,再用热锻方法加工,其他地区同样的耳铛也都来自中国东北。随着这种装饰品成为流行饰品,河西、河套地区甚至草原地区也开始自己制造。不过,中国东北以外的这些地区将其简化为用纯铜或砷铜锻造,这些后来制造的器物,并不体现任何原生文化属性。

四、公元前14世纪喇叭口形器在中国的分布

公元前1400年以来,气候恶化、族群流动,社会面临新的问题,而这又推动着社会变革。

夏家店下层文化循着渤海湾南下,与大坨头文化结合,又深受商文化向北扩展的影响,因而出现了新贵族,他们以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如北京平谷刘家河王墓(19)。此时,喇叭口形装饰品多样化,除了耳铛,也出现喇叭口形臂钏和鬃环。刘家河王墓也出土了黄金喇叭口形耳铛,以及一对双扁状喇叭形金臂钏(公元前1420—公元前1300年,19a-b)^⑪。同样的黄金臂钏也出土于天津蓟县张家园墓地、东北大凌河流域的和尚沟墓地,它们的年代也应相同(9a-b、20)^⑫。燕山南北继续使用锡铜铸造喇叭口形耳铛(19a、21a-b、22—24)^⑬,此外还在制造类似的黄金鬃环(21c-d)^⑭。

公元前1400年以来,有新的族群南下到中国东北燕山两侧地带。其人种大半为古通古斯人和北蒙古人种的结合,他们构成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⑮。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文化并存。此时在东北地区墓葬里偶见喇叭口形铜耳铛(26、27)^⑯或金耳铛(25)^⑰。与此同时,河西地区的四坝文化以及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也开始仿制这些装饰品,只不过改用纯铜、砷铜材料锻造而成^⑱。

此后,锻造的喇叭口形耳铛还经由河西走廊西传到新疆地区。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墓地(29)青铜时代第一期(公元前1500—公元前1300年)墓葬里出土了这种铜耳铛(29a-e),另还出土了银铛(29f-g)^⑲(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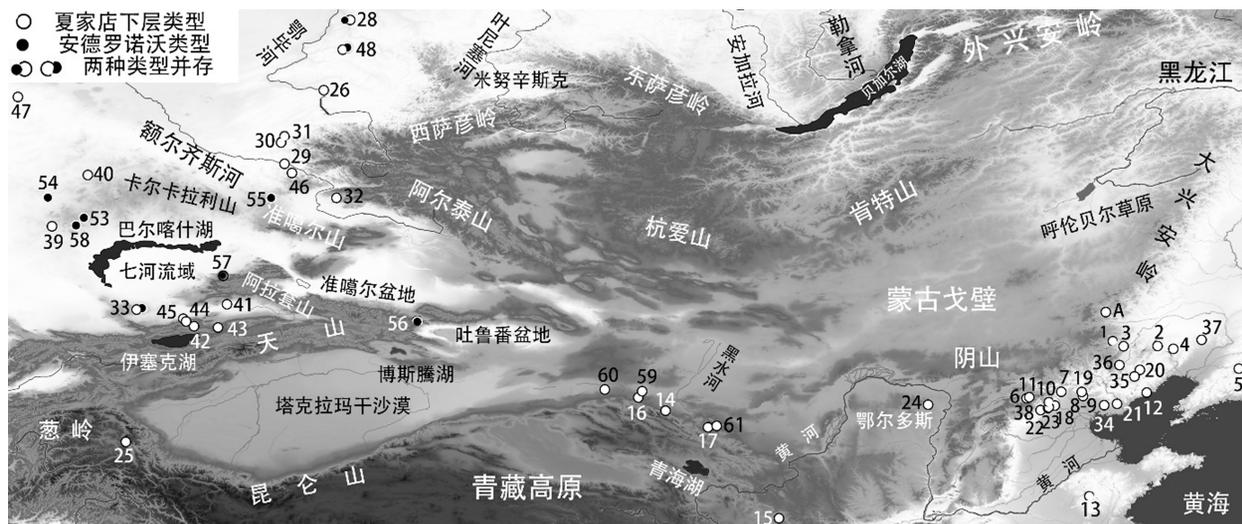


图4 出土东方类型喇叭口形耳铛和铜丝卷耳铛的遗址分布图

五、东来的喇叭口形器与西来的线卷喇叭形器在中亚的交错与区分

大约同一个时期,锻造的喇叭口形耳铛出现在阿尔泰北区,如鄂毕河中游巴尔瑙尔议员大街陵墓(Deputatskaya Ulitsa,公元前1500—公元前1200年,30)出土了两件锻造的包金砷铜耳铛^⑧。阿尔泰西部额尔齐斯河流域锻造的喇叭口形铜耳铛相当多见,不过其年代均在公元前1400—公元前1100年间(32-35)。

大约也在这个时期,喇叭口形耳铛开始出现在天山北麓七河流域(36a)。这些墓葬的人种或多或少都有着蒙古人种的特征,而其墓葬形式则是起源于红山文化并被奥库涅夫文化辗转传承的石板冢墓^⑨。在人种方面可见中亚与东亚的来往,甚至可以看到初步融合的趋势。

至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其最宽泛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740—公元前1300年,核心范围为公元前1600—公元前1400年^⑩。直到公元前1500年之后,喇叭口形的耳铛装饰品才出现在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中,并且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用青铜铸造不同,是用纯铜、砷铜或低锡铜锻造,如南乌拉尔库普赫塔所出耳铛(Kupukhta,公元前1500—公元前1300年,37)^⑪。东亚文化与南乌拉尔地区文化的远程交往,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1400年间才见有少量痕迹^⑫。西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墓地(Tomsk Necropole,公元前1450—公元前1250年)出土了两种锻造的铜耳铛,一种是喇叭口形耳铛(31a),另一种是用铜线卷出的造型似喇叭头的形状(31b)^⑬。

用铜线卷出的喇叭形头的耳铛、臂钏、项圈等装饰品,流行于欧亚大地,多见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其他文化体系,西到多瑙河流域的匈牙利、斯洛伐克地区(公元前1450—公元前1250年,51、50)^⑭。这种装饰品才是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器物,可称为“西式”;其与前述起源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口形器不同,后者可称为“东式”或“中式”。“东式”从燕山地带向西传播,而“西式”从东欧草原向东传播。约在阿拉库文化、费多罗沃文化晚期,即相当于殷商晚期(公元前12—公元前11世纪)时,铜线卷喇叭口形

的装饰品出现在乌拉尔河、托波尔河流域,如托波尔乌巴甘两河流域张吉尔迪墓地、阿列克谢耶夫卡墓地(Dzhangildy、Alexeyevka,52、56)^⑮。铜线卷喇叭形头的装饰品又经过托波尔和额尔齐斯河流域,传到哈萨克草原、巴尔喀什湖和七河地区(53-55)^⑯。该地区铜线耳铛与源自东亚的喇叭口形铜耳铛并存。中国地区只在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墓地出土了一件铜线臂钏(59)^⑰。这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装饰品,通过费多罗沃文化人群,零星地将其带到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虽然如此,这种装饰品在新疆地区仍颇为罕见,再往东就不再出现了。

公元前1200—公元前1000年间,喇叭口形铜耳铛还在继续使用。不过这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出土颇少,且均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二期(39、38)^⑱。此时天山西北麓的七河流域以及巴尔喀什湖周围低山地区的别加兹-丹迪拜文化(Begazy-Dandybai culture,公元前12—公元前8世纪)反而出土很多,进入使用喇叭口形铜耳铛的兴盛期。别加兹-丹迪拜文化中出土喇叭口形铜耳铛的遗址有:泰格门赛墓地(Tegermensay,41)、塔舍图别-Ⅱ墓地(Tash-Tube Ⅱ,40)、桑谷尔-Ⅱ墓地(Sanguyr Ⅱ,49a)^⑲、昆格阿拉套(Küngöy Ala-Too Range)奇利克河边科尔赛-Ⅰ(Kulsay-1,42)墓地;恰伦河边乌尊布拉克-Ⅰ(Uzunbulak-Ⅰ,43a-b)墓地、熊瀑布(Turgen gorge)附近图尔根(Turgen)峡谷寇泽尔布拉克-Ⅰ(Kyzylbulak-Ⅰ,44a-b)墓地、峨寨寮(Oh-Dzhailau)河边阿苏高原(Asu plateau)寇泽尔布拉克-Ⅱ(Kyzylbulak-Ⅱ,45a-e)墓地等^⑳。这些墓地出土的耳铛都比较大,与早期的形状也有明显的差异。泰姆格里-Ⅳ(Tamgaly-Ⅳ)石板冢墓第一号墓出土的铜耳铛特别大,反映了阿尔泰地区猎民的审美。该墓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10—公元前950年(36b)^㉑。

对照巴尔喀什湖两岸的遗址,除了前文所提的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墓地出土的一件臂钏之外,在其东南部七河流域的遗址中,基本上只能见到东亚式的喇叭口形耳铛。而在西北岸卡尔卡拉利山脉遗址中,既有东亚形制的耳铛,亦有安德罗诺沃文化用铜丝制造的喇叭形状的耳

铛。该地区富有铜矿,冶炼技术也稳定,所以这些装饰品应是本地制造,但可以从中看到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直至殷末周初,西来的因素基本上没有越过巴尔喀什湖。到了公元前11世纪,用铜丝制作的似喇叭口形的装饰品,才零星见于巴尔喀什湖南部。而巴尔喀什湖西北部,早在公元前15世纪,西来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的装饰品就已成为主流。

在阿尔泰山脉西侧,一组别加兹—丹迪拜文化墓地也出土有喇叭口形耳铛。如额尔齐斯河边的伊兹梅洛夫卡(Izmailovka)墓地所出耳铛形制很小,其年代可能晚至公元前1200—公元前800年(46)^⑤。在东哈萨克地区,黄金质喇叭口形耳铛一直延续到公元前9世纪,如桑谷尔—II墓区(49b—c)和布拉拜墓区(Burabay, 47a—f)所出土的耳铛^⑥。后者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晚、出土地点最靠西的喇叭口形耳铛,很有可能为早期制作的装饰品流传下来,最后被用作随葬品。泰姆格里—IV石板冢墓(Tamgaly—IV)第三号墓也出土了铜线卷成的耳铛,用线绕出喇叭形状(36c)。巴尔喀什湖附近比延河边的比延陵墓出土了铜线手镯(Büyen, 公元前1000—公元前800年,57)^⑦。中哈萨克贝拉萨尔墓区出土了很多此类装饰品(Belasar, 58)^⑧(图5)。

安德罗诺沃文化之后的艾尔曼文化(Irmen culture, 公元前1000—公元前750年)还继续使用铜线卷出的似喇叭口形的装饰品,如扎里奇涅—I(Zarechnoye—I)墓地第25号陵墓所出^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已经不再制造喇叭口形耳铛。可见,中亚草原出土的喇叭口形的装饰品起源晚于中国,持续使用时间也比较晚。

考古资料表明,铜线卷出的似喇叭口形的耳铛最早出现于东欧,然后东传,在大草原上确实在安德罗诺沃等跨文化人群中普遍使用,但其流行区最东限于巴尔喀什湖西北岸,止于新疆天山,并未继续东传,也从未被华北地区的人群吸收和使用。发源于东亚(具体在燕山地带)的铸造的喇叭口形铜耳铛,其时代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锻造的铜丝卷喇叭口形的耳铛。王鹏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耳铛,证明安德罗诺沃文化年代应该更早^⑩,这种论述预设了喇叭口形耳铛源自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前提,但

考古资料完全否定这种观点,夏家店下层文化喇叭口形器物的制造比该器物在中亚的流行早数百年。

结 语

综上所述,公元前20世纪,铸造的喇叭口形锡青铜耳铛始见于中国东北辽河流域燕山地带夏家店下层文化。到了公元前18世纪夏家店下层文化兴盛时期,墓葬里开始随葬用黄金制造的同类器物。至公元前16世纪,这种装饰品传到黄河流域、河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这时,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开始仿制喇叭口形铜耳铛,并采用当地的纯铜或砷铜以锻造法制作。公元前14世纪以来,喇叭口形耳铛继续向西传到天山和阿尔泰地区,并少量出现在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中。至公元前11—公元前9世纪,这种纯铜或砷铜质地、以锻造法制作的大型喇叭口形耳铛,在阿尔泰西麓仍颇为流行,但在中国地区已不再使用。

笔者认为,喇叭口形的装饰品,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原创的一种器物,反映了中国东北辽河流域是独立的文明起源地区。该地区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模式,至公元前23世纪,建立了独特的连通草原的早期国家文明,致力于发展旱地农业、牧业、冶铸技术、远程贸易和军事防卫系统。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在古国内从事旱作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接待远地来的客人,销售自己的产品;从南方进货,或引入其他珍奇物品。在多元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夏家店下层先民也创造了自己的审美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向草原、森林地带销售粮食、谷酒和其他一些高技术产品,以此交换来自草原、森林的猎获物、皮毛以及宝贵矿物,其中可能有来自黑龙江流域淘洗的黄金。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发现过一些马骨,这应该也是草原来的货物^⑪。

亚洲大草原大致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开始逐渐形成交易网络的雏形。此时,草原族群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或黄河上中游诸族,共同构成互补交错的两种主要交通路线。

第一种可称为西北地区的“黄河交流网”,是

经过汉淮黄流域交接区,过嵩山地带和三门峡咽喉地带,经由关中和黄河中上游各种通道,转

而到达河套或河西,又向北到达阿尔泰、叶尼塞河和鄂毕河流域,广泛连通了东亚及中亚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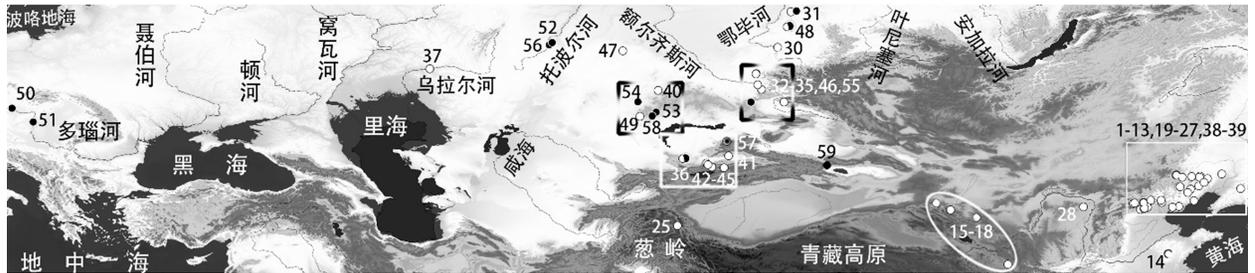


图5 欧亚草原夏家店-四坝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耳铛的遗址分布图

(1-27, 29-32, 34-47 仅出土喇叭口形器; 28, 33, 48 出土两种耳铛; 49-58 仅出土铜丝卷器; 60-62. 目前没有发现喇叭耳环的四坝文化遗址)

1.四分地东山咀遗址; 2.敖汉旗大甸子墓地: 2a. 黄金耳铛(M516:2), 2b—2c. 单喇叭口青铜耳铛, 2d. 扁状双喇叭口青铜耳铛(453:9); 3.二道井子城: 青铜耳铛(F8:3); 4.敖汉旗西大梁遗址(T2426③:1); 5.阜新平顶山遗址: 青铜耳铛(G104④:2); 6.辽宁本溪庙后山遗址: 6a—6b. 七号墓出土的两件青铜耳铛; 7.北京昌平区张营遗址: 7a. 青铜耳铛T12⑤:4, 7b. 青铜耳铛H10:4; 8.河北蔚县三关遗址: 青铜耳铛(82YSGM2014:1); 9.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 9a. 一期的青铜耳铛(F4), 9b. 一号和四号墓出土的两对(M187M4:3), 9c. 三号墓出土的(87M3:3); 10.天津蓟县围坊遗址: 青铜耳铛(T1③:7); 11.河北蔚县前堡墓地: 青铜耳铛(81YKM202:3); 12.河北易县下岳各庄遗址: 耳铛(H5:13); 13.辽宁绥中王岗台遗址: 殷商早期大型青铜耳铛(HBT1076); 14.泗水尹家城: 岳石文化晚期的青铜耳铛(T216⑦:27); 15.甘肃临潭县磨沟墓地: 15a. 铸造喇叭口残部(M886:B4), 15b. 铸造青铜耳铛(M341:10), 15c. 铸造青铜铛(M101:10), 15d. 铸造青铜铛(M358:C3), 15e. 铸造青铜铛(M358:C4), 15f. 锻造的铜铛(M72:B2), 15g—h. 三期早段303号墓出土的铸造锡铜耳铛, 15g.M303:E17, 15h.M303:B18; 三期晚段墓葬出土, 15i. 铸造双扁端青铜耳铛(M227:4), 15j. 单扁端青铜耳铛(M661:9), 15k. 锻造喇叭口形砷铜耳铛(M254:13), 15l. 锻造喇叭口形砷铜耳铛(M711:2); 16.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 16a. 黄金耳铛(M47:12), 16b. 铜铛(M114:2); 17.甘肃民乐六坝镇东灰山遗址: 17a. 金耳铛(M223:1), 17b. 铜耳铛(M79:1); 18.甘肃酒泉市肃州区酒泉干骨崖墓地: 铜耳铛(M73:4); 19.北京平谷刘家河王墓: 19a. 黄金喇叭口形耳铛, 19b. 黄金臂钏; 20.大凌河和尚沟墓地: 双喇叭口耳铛; 21.河北唐山后迁义遗址: 21a. 青铜耳铛(1999LQT1②M6:8), 21b. 青铜铛(1999LQT1②M2:4), 21c. 黄金髻环(1999LQT3②M7:2), 21d. 黄金髻环(1999LQT3②M7:1); 22.北京塔照遗址: 青铜耳铛(FT029); 23.北京琉璃河刘李村遗址: 青铜耳铛(M2:2); 24.河北涞水渐村: 青铜耳铛(H7:21); 25.赤峰宁城小黑石沟遗址: 居住区出土的青铜耳铛(98金采:1); 26.大凌河支流渗津河道虎沟墓地: 青铜耳铛; 27.河北唐山小官庄墓地: 墓主头骨下出土丁:1; 28.朱开沟遗址: 锻造的耳铛(28a.C:189, 28b.M2012:2); 29.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 29a—e. 铜线锻造喇叭口形铜耳铛: 29a.A II M42:5, 29b.A II M39:3, 29c.A II M5A:1, 29d.A II M4:2②, 29e.A II M4:2①, 29f—g.A II M32 出土的白银耳铛, 29f.A II M32:4, 29g.A II M32:3; 30.巴尔瑙尔议员大街陵墓: 包金砷铜锻造耳铛; 31.托木斯克墓地: 31a. 喇叭口形耳铛, 31b. 铜线卷转耳铛; 32.科伊塔斯基区: 锻造的包金喇叭口形耳铛; 33.贾塔斯基区: 33a—33b. 锻造喇叭口形耳铛; 34.切卡诺夫斯基沟-X墓区: 锻造喇叭口形耳铛; 35.阿列伊河别列佐夫卡-1墓区: 锻造的包金喇叭口形耳铛; 36.泰姆格里-VI冢墓: 36a. 锻造的包金喇叭口形耳铛, 36b. 一号墓出土一对锻造的大型喇叭口形耳铛, 36c. 三号墓出土铜线卷转耳铛; 37.安德罗诺沃文化库普赫塔墓地: 砷铜锻造的耳铛; 38.北京镇江营遗址: 青铜耳铛(FZH1257:1); 39.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 青铜耳铛(T106③:1); 40.塔舍图别-II墓地: 锻造的耳铛; 41.泰格门赛墓地: 锻造的耳铛; 42.奇利克河边科尔赛-I: 锻造的耳铛; 43.乌尊布拉克-I: 43a—43b. 锻造的耳铛; 44.寇泽尔布拉克-I: 44a—44b. 锻造的耳铛; 45.寇泽尔布拉克-II: 45a—45e. 锻造的耳铛; 46.伊兹梅洛夫卡遗址: 锻造的耳铛; 47.布拉拜墓地: 47a—47f. 锻造的喇叭口形铜铛; 48.比延陵墓: 48a. 锻造的耳铛, 48b. 铜线卷转耳铛; 49.桑谷尔-II墓地: 49a—49c. 锻造的喇叭口形耳铛; 50.斯洛伐克墓地: 铜线卷转戒指; 51.科齐德尔墓地: 铜线卷转臂钏; 52.张吉尔迪墓地: 52a. 铜线卷转臂钏, 52b. 铜线卷转戒指; 53.科伊索基石板冢墓: 53a. 铜线卷转臂钏, 53b. 铜线卷转耳铛; 54.桑格鲁石板冢墓: 铜线卷转臂钏; 55.小卡拉苏石板冢墓: 铜线卷转臂钏的碎片; 56.阿列克谢耶夫卡墓地: 铜线卷转手镯; 57.巴尔喀什湖附近比延河边比延陵墓: 铜线卷转手镯; 58.贝拉萨尔墓区: 铜线卷转手镯; 59.乌鲁木齐县白杨沟村萨恩萨伊墓地; 60.鹰窝树遗址; 61.西灰山; 62.砂锅梁。

第二种可称为“东北交流网”，这是通过长江淮河流域及沿海地带到达渤海湾，然后经由辽河流域及燕山地带这个东北咽喉之地，向北转进到东北平原和森林地带，又向西转到蒙古草原、阿尔泰以及宽广的草原走廊。

这个时期的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带尚未沙漠化，所以西起里海、东到日本海的大草原南部地带，成为流动族群的交通大道。在今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中国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的草原及丘陵一带，流动族群频繁互动、迁徙，彼此攻战、学习、吸收、传播、交流。同时，战争掠夺族群在北纬40—50度的草原带建立了很多据点，其中也有一些地区如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发展出了致力于远程贸易的国家体系。喇叭口形装饰品只是草原流行的货品之一。关于其他货物的来源与走向，笔者将另文探讨。

注释

① Emma C. Bunker.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Tarim Basin Vicinity and Its Impact o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in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ume II. Washington: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pp604—618;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168页;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台湾)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4—251页。② 林沅:《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5页。③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第427页,图一一右。括号内数字为文中图片和地图中的文物编号,可以对照参看,下同。④ 夏家店文化分期参见李舒涵:《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与社会演进》,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1页。⑥ 崔岩勤:《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器简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⑦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8期,第25页,图一八右。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等:《内蒙古敖汉旗西大梁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2023年发掘简报》,《考古》2025年第1期,第37页,图三〇。⑨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考

古》1992年第5期,第403页,图八:5。⑩ 李延祥、贾海新、朱延平:《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铜器初步研究》,《有色金属》2002年第4期;李延祥、朱延平、贾海新等:《辽西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2期。⑪ 董新林:《高台山文化研究》,《考古》1996年第6期。⑫ 李恭笃:《辽宁东部地区青铜文化初探》,《考古》1985年第6期。⑬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60页。⑭⑮ 陈坤龙、王璐、王颖琛等:《河北蔚县出土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文物》2017年第6期,第85页,图一:2。⑯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96—98页,图九二。⑰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63—171页。⑱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涑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⑲ 成璟璐、孙建军、孟玲:《辽宁绥中中东王岗台发现商周窖藏铜器》,《文物》2016年第3期,第69页,图三:11。⑳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204、243、338、354—358页。㉑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3期。㉒ 孙淑云、潜伟、王辉:《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成分分析及制作技术的研究》,《文物》2003年第8期;陈坤龙、王璐、王颖琛等:《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的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18年第2期。㉓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191—193页。㉔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酒泉干骨崖》,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222—241页。㉕ Xinyi Liu, Emma Lightfoot, Tamsin C. O'Connell et al. *From necessity to choice, dietary revolutions in west China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World Archaeology*. October 2014: 1—20; 陈建立、毛瑞林、王辉等:《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铁器与中国冶铁技术起源》,《文物》2012年第8期。㉖ 王璐:《甘青地区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53页。㉗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丝绸

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墓地齐家文化墓葬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6期。⑳王璐、梅建军、陈坤龙等:《甘肃临潭县磨沟遗址出土齐家文化铜器的分析与研究》,《考古》2022年第7期。㉑徐建伟:《甘青地区新获早期铜器及冶铜遗物的分析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㉒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㉓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北京文物与考古》1992年第3期;王丹:《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4—40页。㉔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第4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8期;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图五:3。㉕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房山县文教局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第60页,图四: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涿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第227页,图十一: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268页。㉖张文瑞、翟良富:《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冀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05页。㉗朱泓、王成生:《彰武平安堡青铜时代居民的种族类型》,《考古》1994年第2期。㉘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第87页,图七:2;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考古学报》1954年第1期。㉙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图二〇八:6。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439页;周静:《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下坂地墓地》,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1—103、145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4年第3期,图一二一:7—13。㉜В.Б. Бородаев; Ю.Ф. Кирюшин; А.Л. Кунгуро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арнаул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Барнаула. Барнаул: Алтай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3; 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Грушин; Дмитр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апин; Ольг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Позднякова; 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Тюр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Федорук; 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Хаврин. *Алтай в системе 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их провинций энеолита и бронзового века*. Барнау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

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9, с.59–65。㉝К.А. Акишев, (Отв. ред.).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в зоне затопления Шульбинской ГЭС*. Алма-Ата: Наука, 1987, сс.34–37, рис.17:1; А.С. Ермолаев. *Памятники предгоной зоны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Эпоха бронзы – раннее железо)*. Алматы: Институт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м. А.Х. Маргулана, 2012, сс.25–29; М.А. Демин & С.М. Ситник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Гилёв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Барнаул: БГПУ, 2007, сс.31–66, рис.35; М.А. Демин & С.М. Ситник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Гилёв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1, сс.8–65, 129–149, 173–174, 181, рис.9; М.П. Грязнов. *Погребения бронзовой эпохи в Западном Казахстане. Казак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Вып. II. Л.: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27, сс.172–221; А.С. Ермолае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предгоной зоны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Эпоха бронзы – раннее железо)*, сс.29–32; А.Е. Рогожин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и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урочища Тамгалы*. А.Н. Марьяше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и археология Семиречья*. Алма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фонд «X XI век», 1999, сс.33–42, рис.19。㉞В.В. Евдокимов; В.В. Варфаломеев. *Эпоха бронз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Караганд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арГУ, 2002; В.А. Новоженев. *Чудо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и древнейший колес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Евразии*. М.: Таус, 2012, сс.277–282; Igor Chechushkov. *Bronze Age Human Communities in the Southern Urals Steppe: Sintashta–Petrovka Social and Subsistence Organization*; Грязнов, М.П. (Ред.). *Комплекс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у горы Тепсей на Енисее*, сс.4–5; В.В. Ткачев. *Степи Южного Приуралья и Запад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на рубеже эпох средней и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Актобе: Актыбинский областной центр истор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 археологии, 2007。㉟Е.Е. Кузьмина. *Купухта — могильник андроновской знати*.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Вып.93.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амятников эпохи энеолита и бронзы*.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3, сс.96–105; Е.Е. Кузьмина. *Откуда пришли индоарии?* Матер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племен андроновской общности 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ндоиранцев.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4。㊱А.В. Епимахов. *О факторах культурогенеза населения Южного Урала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А.Д. Таиров. (отв. ред.) *Этнически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на Южном Урале*. Челябинск: Челяби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6, сс.25–29。㊲А.В. Андриановъ. *Том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ъ. Отчетъ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iи за 1889 Год*.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ъ: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іи Наукъ, 1892, сс.99–111。㊳Marija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ague: Mouton

& Co., 1965, pp.71–112。④⑦С.С. Калиева; А.В. Колбина; В.Н. Логвин. *Некрополь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Джангильды 5. Костанай: «Костанайполиграфия» ЖШС, 2016, с.74; Marija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109。④⑧М.К. Кадырбаев & Ж.К. Курманкулов. Культура древних скотоводов и металлургов Сары–Арки. Алматы: Наука, 1992, сс.76–86, 108–118, 239–240; А.С. Ермолаева. Погребения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могильников Малое Карасу и Ковалевка Левобережного Итгыша. А.Н. Марьяшев Ю.А. Молото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и археология Семиречья, выпуск 2*. Алма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фонд «X XI век»;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фонд «Родничок», 2001, сс.102–111。④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萨恩萨伊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5页。⑤⑩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北京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第268页,图182:4。⑤⑪М.К. Кадырбаев. Могильник Сангуйр II.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Т.ХII (Археология). Алма–А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1961。⑤⑫А.Н. Марьяшев & А.А. Горячев. Памятники кульсайского типа эпохи поздней и финальной бронзы Семиречья. А.Н. Марьяше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и археология Семиречья*. Алма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фонд «X XI век», 1999, сс.44–82; А.А. Горячев. О погребальном обряде в памятниках кульсайского типа. А.Н. Марьяшев & Ю.А. Молото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

я и археология Семиречья, выпуск 2. Алма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фонд «X XI век»;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фонд «Родничок», 2001, сс.45–62。⑤⑬А.Е. Рогожин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и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урочища Тамгалы, сс.7–43, рис.16–17。⑤⑭А.С. Ермолае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предгоной зоны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Эпоха бронзы – раннее железо)*, сс.66–75, 192。⑤⑮А.Х. Маргула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 *Бегазы–Дандиба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ты: Атамура, 1998, сс.365–369。⑤⑯К.М. Карабаспакова. *Жетысу и Южный Казахстан в эпоху бронзы*. Алматы: ТО О НИЦИА «Бегазы–Тасмола», 2011, сс.111。⑤⑰А.Х. Маргулан. *Бегазы–Дандиба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сс.93–105。⑤⑱Л.Н. Мыльникова; И.А. Дурakov; Л.С. Кобелев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ургана № 25 могильника Заречное–11. Н.П. Матвеева (Ред.). *Андроновский мир*. Тюмен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юме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сс.98–117。⑤⑲Ван Пэн.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ультур бронзового 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Синьцзяна 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итая. *Вестни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Том 17, 2018, № 4, сс.16–29。⑥⑰郭静云:《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牧族群》,《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 林云.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J].边疆考古研究, 2002(1):5.
- [2]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2.

Chinese Civilization's Influence on the Cultures of the Central Asian Steppes: A Case of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Guo Jingyun, Guo Lixin

Abstract: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made of bronze or gold originated from the Lower Xiajiadian civilization in the Yan Mountain region in Northeast China, dating back to the 20th century BC. These ear-ornaments were initially cast from tin bronze, and later, similar artifacts were made from gold. In the 16th BC, this type of ornament had spread to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Hetao region, and the Hexi Corridor. In the Hexi Corridor, the Siba culture produced imitations of the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using pure copper or arsenic bronze. After the 14th BC, these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made from pure copper or arsenic bronze, continued to spread westward to the Tianshan and Altai regions, where they appeared in small quantities at Andronovo culture sites. After the period from 12th century BC to 11th century BC, such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remained popular in the western foothills of the Altai Mountains and the Balkhash Lake basin, though they had fallen out of use in China. The westward transmission of these artifacts provides a specific example of the early process of east-west connections across the steppe.

Key words: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Eurasian steppe; northern bronze ware; steppe artifacts

[责任编辑/启 轩]